

中国的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研究*

马 晓 林**

■ 摘 要 ■

蒙元时期欧亚丝绸之路的积极意义, 日益受到全世界范围的重视。中国的蒙元史研究有悠久的学术传统, 具有超越国别史的视野, 重视多语种文献, 都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必备条件。中国学者在蒙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移民、物质文化与艺术的传播、旅行记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马可·波罗研究, 涵盖了东西方学术中的众多领域, 在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 丝绸之路 欧亚交流 蒙古帝国 元朝

— 목 차 —

I. 緒 論	VI. 族群迁徙及其文化影响
II. 术语传统	VII. 物质文化与艺术的传播
III. 概说书与工具书	VIII. 旅行记
IV. 海上丝绸之路	IX. 马可·波罗研究
V. 陆上丝绸之路	X. 展 望

I. 緒 論

13~14世纪, 蒙古席卷欧亚大陆, 统治疆域之广阔, 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近代以前, 蒙古的统治往往被打上野蛮的标签, 甚至被视为阻碍文明进步的“鞑靼之轭”(Tartar Yoke)。但从20世纪后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蒙古时期的积极因素。无论是英国学者波义勒(J. A. Boyle)提出的“蒙古世界帝国”(Mongol World Empire),¹⁾ 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J. L. Abu-Lughod)的“1250~1350年世界体系”,²⁾ 梅天穆(Timothy May)的“成吉思大交换”(Chingis Exchange),³⁾ 还是日本学者本田实

* 이 논문은 2018년 11월 30일 개최되었던 제48회 동양학국제학술회의에서 발표되었던 논문을 수정·보완한 것입니다.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副教授 / Maxiaolin@nankai.edu.cn

1) John Andrew 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London: Variorum, 1977.

信的“蒙古时代史”,⁴⁾ 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⁵⁾ 以及杉山正明的“蒙古颠覆世界史”,⁶⁾ 都强调蒙古将欧亚世界各大文明区域紧密地联结起来, 开启了东西方交流大畅通的时代。丝绸之路, 广义上指的是联结欧亚非大陆各区域的海陆交通路线及沿线的文明与文化交流。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全球史视野之下, 丝绸之路是学术界最为注目的课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蒙元时期的跨文化交流的关注日益增多。⁷⁾ 本文梳理中国学术界对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研究,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交通路线、族群迁徙、文化传播、旅行记等方面, 重点评述近年的研究状况, 并展望未来。

Ⅱ. 术语传统

在中国史学界, 蒙元史研究一向被认为是最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域。元史、蒙元史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本来就有模棱两可之处。元史一般指使用“大元”这一国号的时期(1271~1368年), 蒙元史则一般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算起(1206~1368年)。但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显, 元史研究常常涵盖1206~1271年之间的时段。蒙元史主要是中国断代史的一部分, 但常常超越中国史的地理范畴, 实际上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各个方面。本文取蒙元史指涉时空范畴最宽泛的涵义。

“丝绸之路”这一术语, 在过去中国的蒙元史学界使用不够普遍。“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在1877年提出的, 20世纪才传入中国。早在李希霍芬之前, 元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抵道咸以后, 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道咸”即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西北”指的是西域、漠北。从19世纪中叶开始, 西北地理与元史学所关注的热点, 主要是历史地理。西域指的是中国西部及中亚甚至西亚、欧洲, 漠北指的是蒙古高原。研究西域、漠北历史地理, 实际上就是研究丝绸之路。当20世纪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 元史研究已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脉络和术语体系, 不需要借用这个新词汇。

20世纪前期, 中国元史研究的价值取向, 出现了两个突出的现象。第一, 强调“华化”或“汉化”。代表作是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关注元代从西域迁居中国的移民。尽管这种研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

2)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欧洲霸权之前》,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3)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2012. 马晓林、求芝蓉译:《世界历史中的蒙古征服》,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

4)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過去・現在・将来》, 《世界史を变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のデッサン》, 角川书店, 2000年, 第162-226页。

5) 冈田英弘《世界史の誕生: 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統》, 筑摩书房, 1999年。

6)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 日本経済新聞社, 2006年。

7) 西方学术界研究概况, 参见Peter Jackson, ‘The State of Research The Mongol Empire, 1986~1999’,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6(2000): 189-210. David O. Morgan, *The Mongols*,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7. Michal Biran, ‘The Mongol Empire: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Compass* 11/11, 2013: 1021-1033.

价值判断,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搜集了大量资料,具有开拓性。第二,带有欧洲东方学、汉学传统的印记。从欧美留学归国的翁独健、姚从吾、韩儒林、邵循正,被称为“元史四大家”,成为20世纪中国元史学科的奠基人。他们皆推崇以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为代表的汉学传统,注重语文学(philology)以及多语种文献。在这两种传统之下,学者们既单方面强调“华化”,又不免“自我东方化”。实证研究中,经常涉及跨文化交流的细节。1950年代以后,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缺乏交流,很多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元史研究者翻译了大量英语、日语、俄语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创造了条件。1980年以前,元史研究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丝绸之路”一词。到1980年以后,“丝绸之路”成为强调文化交流的符号,“草原丝绸之路”、“海洋丝绸之路”在元史研究中的使用才逐渐增多。

自近代以来,元史学就覆盖汉、蒙古、突厥、波斯、拉丁等诸多语言文字和地域,具有超越国别史视野,重视语言研习,具备研究丝绸之路的条件。

Ⅲ. 概说书与工具书

蒙元时期的政治形态和历史背景,是理解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必要前提。中国学者必读的元史研究的概说书,是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元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其中的导论部分近年单独成书,即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是关于史料和研究概况的便捷工具书。自1980年以后,中国元史研究发展很快,20世纪以后,成果层见叠出,改变和修正了以往的很多认识。目前能体现出最新进展的概说书,是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 2014)。

19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多国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被推举为国际考察队副队长(阿曼-巴基斯坦路段)、队长(印度-斯里兰卡-印度路段)。刘迎胜为此撰写了《丝路文化·草原卷》与《丝路文化·海上卷》两部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最近这两本书合并为《丝绸之路》一书再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刘迎胜还出版了大型图册《话说丝绸之路》(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7),是言简意明的通俗读物。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作者论文的结集,论述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陆峻岭从事文献整理工作,编有工具书《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 1979),《西域地名》(冯承钧原著,中华书局 1980)、《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与陈佳荣、谢方合著,中华书局 1986)、《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费琅著,冯承钧译,陆峻岭注,中华书局 1957)。陈佳荣、朱鉴秋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6)收录了先秦至清代海路行程、针经导航160种资料,其中元代相关资料10余种。

21世纪,历史研究中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技术。历史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爱如生”、“雕龙”等,收录大量史料,检索功能为学者带来极大便利。

IV. 海上丝绸之路

在“丝绸之路”一词广泛使用之前，元史学界最常用的词是海外贸易。著名学者陈高华是最早梳理相关文献的学者，先后撰写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吴泰合作，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中国海外交通史》(与陈尚胜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陈高华的文集《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中也收录了《元代的航海世家澈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等文章。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是一部重要专著，对元朝与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有全面研究。高荣盛还撰有《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元沙不丁事迹索考》《古里佛/故临——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与运作》《元代“舶牙人”通考》等文，都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重要文章，皆收入氏著《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 2010)。

2012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组建，推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刘迎胜教授是“南海史地与文化”的主要负责人。刘迎胜的论文集《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收录论文31篇，涵盖宋元明清时期海洋地理、贸易、旅人、知识等诸多问题。

汪大渊《岛夷志略》是研究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读书。有苏继庠注解本(中华书局 1981)。周运中《岛夷志略地名与汪大渊行程新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7, 2014)认为汪大渊出洋两次，一次从占城经单马令、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另一次从泉州经澎湖、吕宋、卡拉棉群岛、文莱到爪哇。周运中的著作《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也有不少关于元代丝绸之路的论述。

关于元朝与东南亚的交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1)提供了关于元代真腊(柬埔寨)的丰富资料和见解。关于元朝与安南的关系，党宝海《昔里吉大王与元越战争》(《西部蒙古论坛》2013-4)发现蒙哥之子昔里吉在漠北反叛忽必烈失败之后，被派往安南前线作战，即《安南行记》所载昔戾机，昔戾基大王。毛海明《元初诸王昔里吉的最终结局》(《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34, 2017)在《高丽史》中发现昔里吉(又译石列纥)最终被流放到高丽的人物岛，印证了波斯文史书《史集》所记昔里吉被流放至海岛而死的结局。

13世纪末，元朝出兵泛海远征爪哇。元朝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但直接导致了麻喏巴歇王朝的建立，对东南亚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刻影响。王颀《元王朝与爪哇的战争和来往》(《史林》2006年第4期)将汉文史料一网打尽。邓进荣利用爪哇语史料的英译本(David Bade, *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 the Mongol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Java*, Ulaanbaatar, 2002)，发表《元朝征爪哇史事考》(《华冈史学》3, 2015)。

V. 陆上丝绸之路

蒙古帝国维持其广阔疆域，仰赖信息传递与驿站交通。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 2006) 是全面研究驿站制度，研究对象以元朝为主，也涉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党宝海《伊利汗国蒙古文牌符考释》(《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 考释伊朗发现的一件回鹘体蒙古文铭文银牌，认为其为传送紧急公文所用，反映出伊利汗国受到元朝急递铺制度的直接影响。地理知识通过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传播，体现在现存的地图中。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 2010) 是陈得芝、姚大力、高荣盛、杨晓春等共同参与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对元朝所获得的欧亚世界地理知识问题做出了集中讨论。邱铁皓《舆图原自海西来——〈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西域研究》2011-2) 以一幅14世纪上半叶绘制于大不里士的世界地图为中心考察元朝西域地理知识的来源。

内陆亚洲，在元史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1970年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的元代岭北行省地图是陈得芝的研究成果。陈得芝为了编绘地图，对蒙古高原地理做了全面而精湛的研究。可惜的是这部书稿收藏在南京大学，至今未能出版。陈得芝另撰有《元岭北行省建置考》《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耶律楚材诗文中的西域和漠北历史地理资料》等文，收入《蒙元史丛稿》(人民出版社 2005)。

察合台汗国位于蒙古帝国的中央，控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因此必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刘迎胜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察合台汗国的学者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为《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再版)，后来出版的厚重的专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在13~14世纪内亚政治、交通方面具有开创性。党宝海《察合台汗国时期的孛罗城及其周边》(《西部蒙古论坛》2015-4) 考订现藏德国、俄国的两件察合台汗国蒙古语官方文书(TM214; G120) 分别写于1343、1339年，证明孛罗城(今新疆博乐市达拉特古城) 当时是一座重要城市，也孙帖木儿汗曾驻蹕其附近。当地出土了大量察合台汗国钱币(蒋其祥、李有松《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初步研究》，蒋其祥《西域古钱币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6)。察合台汗国钱币以花刺子模、波斯钱币为原型，加入了蒙古察合台家族的徽记(王樾《对于察合台汗国钱币研究的若干认识》，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2016)。新疆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钱币很多，仅伊犁文物部门1980年以后征集所得的察合台汗国钱币就有1595枚(安英新、邓丽《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察合台汗国钱币初探》，《新疆钱币》2017年 第1期)，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研究。

关于13~14世纪的西伯利亚，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元蒙史札》) 详细考察当时西伯利亚各地区、各部族的状况。

金帐汗国与元朝之间路途遥远，但联系不断。蔡美彪《拔都平阳分地初探》(《辽金元史考索》 中华书局 2012) 揭示了金帐汗国统治家族在山西拥有的分封食邑，元朝屡次派遣专人护送财物前往金帐汗国。《元史》 记载，金帐汗国统治者扎你别(Janibeg, 1342~1357在位) 遣使进献礼物。蔡美彪、马文宽《元史扎你别进贡条诠释》(《辽金元史考索》)，黄时鉴《元代扎你别献物考》(《黄时鉴文集》 中西书局 2011) 二文各自独立研究考订了礼物的内容，指出这些礼物中有钦察草原的物产，也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治下的产品。邱轶皓《14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刺和林情报考——兼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远洋商人》(《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主要利用阿拉伯语史料，揭示出马穆鲁克与蒙古高原之间以金帐汗国为中介的商业交往。

波斯语在中世纪丝绸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黄时鉴《波斯语在元代中国》(《黄时鉴文集》) 讨论了“回回文”、“亦思替非文”、“普速蛮字”、“Tāzīk文” 的含义，指出波斯语是元朝官方语言之一。刘迎胜是中国最早专攻波斯语史料的学者之一，尤其关注波斯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作为通用语(lingua franca) 的地位，称之为“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他的成果，见论文集《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三联书店 2013)、《蒙元史考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小儿锦” 是一种以波斯、阿拉伯文字拼写汉语的文字，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部分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下层群众中使用。刘迎胜《小儿锦研究》 三卷(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考察了小儿锦的创制背景，研究了元明时期回回人与伊斯兰文化入华、波斯语的学习，并且从“表意词” 的角度对小儿锦的词源进行了全面解读。魏曙光《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8) 主要基于波斯语史料讨论蒙古帝国前期史。陈春晓《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关系史新考——记1258~1265 年间的三次遣使事件》(《清华元史》 第4辑，2018) 重点发掘利用了两种伊利汗国时期波斯语史料《世系汇编》 和《武功纪》。

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密切关系，促进了波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Rashid al-Din) 搜集东西方资料，用波斯语编纂成《史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史之一。《史集·蒙古史》 中保存的蒙古帝国史料最为珍贵，备受学术界重视，余大钧、周建奇根据1950年俄译本译为汉文3卷4册(商务印书馆 1983)。拉施特的《史集·中国史》 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非汉语书写的较完整的中国史。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 2006) 将波斯语原文翻译为汉语，并做出了精湛研究。王一丹的文章《拉施特与汉学》，梳理了当时波斯人如何学习、介绍中国文明。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翻译的是拉施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其主体为医学著作《王叔和脉诀》 的宋代点评本的波斯语译本。

VI. 族群迁徙及其文化影响

13~14世纪，西域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其数量之多，来源地之复杂，前所未有。

东迁穆斯林数量极多。杨志玖是元代回回(穆斯林)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元代回回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华书局 2015 再版)对回回的迁徙、政治地位、文化活动以及重要人物都有讨论,还考察了阿儿浑人、啰哩回回(吉普赛人)。元代穆斯林移民留下了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海南、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北京、宁城等地皆有发现(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中华书局 2012)。杭州凤凰寺集中保存了一批穆斯林碑铭。英国学者莫尔顿(A. H. Morton)、伊朗学者乌苏吉(Vosughi)与中国学者王一丹、周思成等合作《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 2015),首次将这批碑铭全面释读发表。元代穆斯林移民便开始编纂家谱,不少留传至今。最近学者找到了一些存有元代史料的家谱,有的还保存着阿拉伯文、波斯文内容(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民族研究》2012-1。马保全《山东博物馆藏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世界宗教文化》2014-2)。

阿儿浑人原居中亚,史料较少,留下了很多谜团。周清澍《马可·波罗书中的阿儿浑人和纳失失》(《元史论丛》第8辑,2001)证明阿儿浑人迁居天德、丰州、荨麻林等地。何启龙《七河景教碑属于阿儿浑人之说》(《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2,2010)对中亚七河地区墓群的主人提出了新说。毛海明《元代的一个阿儿浑人家庭》(《民族研究》2014-2)利用方志资料,确定了一个迁居中国的阿儿浑家庭。

元代是继唐代之后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信奉基督教叙利亚东方教会(又称“聂思脱里教”或景教)的教徒从中东、中亚而来。早在20世纪上半叶,翁独健即以入仕元朝的叙利亚基督徒爱薛为博士论文题目。韩儒林也发表《爱薛之再探讨》(收入《穹庐集》)。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发现的大量叙利亚文碑铭,价值很高。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不过碑铭译释仍有很多探讨余地。牛汝极还刊布了其他相关文物(《新发现的十字莲花景教铜镜图像考》,《西域研究》2017-2)。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陈高华《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材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 2011)揭出汉文方志中关于山东济宁景教家族的资料。这个家族从阿力麻里迁居草原,再迁济宁。马晓林将此家族的祖先与1980年代内蒙古赤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墓碑的主人勘同(《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5-1)。

党宝海《关于元朝犹太人的汉文史料》(《中国史研究》2005-3)指出《至正金陵新志》中的“珠笏氏亦思哈”为犹太人,以人名亦思哈(Isaac)为线索找到了元代其他史料中的一些犹太人。

欧亚草原西部的阿速、钦察、康里,在蒙古西征过程中归附蒙古而迁徙至东方。何高济、陆峻岭《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华书局 2013)研究了进入元朝的阿速、钦察、康里、回回人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中亚东部、新疆的畏兀儿(Uyghur)、哈剌鲁(Qarluc)也向东迁徙。陈高华将相关汉文资料汇集为《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9)

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汉文史料研究天山畏兀儿、东迁畏兀儿。尚衍斌进一步讨论东迁畏兀儿等西域人的文章，收入《元史及西域史从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元代多民族的迁徙，影响了民族的演变与形成。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幽王到裕固族大头目》(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 利用出土文书、题记、遗迹以及裕固族谱牒，研究元代幽王家族统治下的河西地区，认为裕固族的形成与蒙古幽王家族有密切关系。

入元的西域人，逐渐有了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热情很高。早在20世纪初陈垣就发表了开创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搜罗史料，考察了100多位移民诗人。在理论上最有创见的是萧启庆提出的元代“多族士人圈”，即多民族士人主要以汉文化尤其是科举为中心而结成的交际网络。萧启庆利用大量资料，梳理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公司 2008。《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联经出版公司 2012)。这一理论在文学史界影响很大。元代文学作者的籍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西亚地中海，前所未有的多元出身，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文学风格上的新风貌。“多族士人圈”已经成为很多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人民出版社 2016)。

Ⅶ. 物质文化与艺术的传播

物质文化与艺术的传播，是东西方交流的直观表象。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 2007)、《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 2013) 讨论了考古、石雕、陶瓷、绘画等诸多方面，搜集世界各地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广泛触及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交流问题。

丝织品是蒙元时期跨地域技术交流中的突出代表。赵丰、尚刚、龙博编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开明出版社 2014) 第七章“蒙元时期的纺织文化”，包括考古发现、纺织技术、纺织品种、纺织品艺术。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黄山书社 2016) 第11、12章分别研究元朝与高丽之间的丝绸交流、中国与波斯织工的交流。

元代最知名的织物，当属蒙古皇室贵族趋之若鹜的纳石失(织金锦)。纳石失是波斯-阿拉伯语音译。元朝在弘州(今山西大同)、荨麻林(今河北张北)、大都(今北京)等地设立了五个“局”，专门织造纳石失。在其中服务的织工多为西域人，尤其以中亚回回为主。周清澍《关于别失八里局》(《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指出这个官营织造机构至元十二年(1275) 从别失八里迁移到了元大都。

尚刚是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开拓者，他的《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用很大篇幅讨论了纺织品的织绣印染。《古物新知》(三联书店 2012) 一书收录了尚刚的多篇重要论文。纳石失原是一种伊斯兰织物，在蒙古帝国广为流行(《纳石失在中国》、《蒙元织锦》)。刻丝是中国传统的织造

技术,在元代又有发展,体现出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元朝刻丝的功用与其折射的文明》)。元朝皇帝、皇后肖像,采用绘画、织锦两种形式,画师来自中国、尼泊尔(《元朝御容》)。尚刚《撒答刺欺在中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1)梳理了中亚织物“撒答刺欺”技术与工匠在元朝的繁荣。

元代最受世人瞩目的瓷器是元青花。尚刚《苍狼白鹿元青花》、《元朝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皆收入《古物新知》)论述了元青花与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林梅村《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文物》2018-12)以2013年发掘的实物材料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1295年。

忽思慧《饮膳正要》是元朝宫廷食谱,记录了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食材、香料、饮食方式,是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尚衍斌等《饮膳正要注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对非汉语名词做了全面注解。

阿拉伯医学传入蒙元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回回药方》一书。宋岷《回回药方考释》(中华书局2000)逐词注解,揭示其书与几种阿拉伯古代医书的直接关系。

宋岷《“回回石头”与阿拉伯宝石学的东传》(《回族研究》1998-3)对《辍耕录》中的“回回石头”条目逐一还原考释,阐明了阿拉伯宝石学在元代的传播。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2016-1)确定汉文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是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的“甸子”,论述了绿松石的产地与输入中国的路线。

随着蒙元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增进,蒙古人的形象出现在了欧洲艺术中(郑伊看《蒙古人在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艺术中的“蒙古人形象”问题》,《美术研究》2016-5)。蒙元时期中国艺术对于波斯的影响非常显著。艺术史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蒙元时期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影响。李军《“从东方升起的天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建筑学报》2018-4)论述了蒙古帝国对于欧洲教堂的空间、图像的影响,认为应当在东西方深刻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往的语境之中看待欧洲的文艺复兴。湖南省博物馆编《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2018)是李军策划的展览图录,其中收录了李军的论文《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墙〈耕织图〉再研究》《13~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意大利商人》等,揭示出蒙元时期中国与欧洲知识与艺术的交流,以及中国绘画题材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

VIII. 旅行记

蒙元时期,最早进入东亚的欧洲人旅行记。道森《出使蒙古记》(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有元史学者周良霄的注释。耿昇据法译本翻译了《柏朗嘉宾行纪》(Plano Carpini) (中华书局 1981)。何高济据英译本翻译了《鲁布鲁克东行记》(William of Rubruck), 《海屯行记》(Hayton)、《鄂多立克东游录》(Odoric of Pordenone) 等(中华书局 1981)。余大钧、蔡志纯据俄译本译出《普兰·迦儿宾行记》和《鲁布鲁克东行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0)。西蒙·圣宽庭(Simon of St Quentin)《鞑靼史》也是一部重要行记, 张晓慧将让·里夏尔(Jean Richard) 法语译注译为汉文(《西域文史》11, 2017)。舒健《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的高丽王子考》(收入舒健, 张建松《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 考订柏朗嘉宾所记之人为高丽新安公王侄。

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是与马可·波罗齐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与马可·波罗同样行程遥远, 同样归国后口述而成旅行记。但中国对伊本·白图泰的关注远不及马可·波罗, 根本原因是中国兼通阿拉伯语及元史的学者少。目前《伊本·白图泰游记》有2种汉译本。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是节译本。李光斌译《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海洋出版社 2008) 是全译本。李光斌也出版了著作《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海洋出版社 2009), 但历史层面的探讨不深。

蒙元时期最著名的中国旅行者当属长春真人丘处机。全真掌教丘处机携弟子从山东经燕京(今北京) 至蒙古草原, 经天山至中亚, 觐见西征中的成吉思汗。随行弟子李志常记其行程见闻, 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是一种简要的普及本。尚衍斌、黄太勇《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 校勘、注释丰富, 便于学者利用。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大臣耶律楚材撰有《西游录》二卷, 第一卷述西域交通与风土, 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史料。此书有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版; 2000年再版)。

13世纪中叶出使波斯的汉人常德, 留下了汉文文献中极为罕见的关于波斯的记载。以往多有研究, 集大成者是陈得芝《刘郁〈常德西使记〉校注》(《中华文史论丛》2015-1)。

IX. 马可·波罗研究

蒙古时代贯穿欧亚世界的旅行者, 是丝绸之路大贯通的亲历者。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研究的丰富性, 在当前中国的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

学术价值较高的《马可·波罗行纪》汉译本有3种。张星娘《张译马哥孛罗游记》(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 1929) 译自裕尔(Henry Yule) 本第一卷。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 1936) 底本是沙海昂译注卜铁(G. Pauthier) 法语本, 据刺木学(Ramusio) 本补译, 并加了注释。张星娘译《马哥孛罗游记》(商务印书馆 1936) 译自 L. F. Benedetto 1932年意大利文本的英译本, 但删除了注释。党宝

海补注的冯承钧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是当今最好的汉译本。

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但杨志玖(1915~2002)在1941年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12),在元朝政书《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一则关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往波斯的史料,三位使臣名为兀鲁鹄(Ulu'utai)、阿必失呵(A'bīsqā)、火者(Khwāja),与马可·波罗所述的 Oulatai、Apousca、Coja相符,正是马可·波罗取道波斯归国的明证。迄今为止这仍然是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最有力证据。

余士雄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将1983年以前发表的重要文章几乎全部收录。1991年是马可·波罗离华700周年,中意两国举办庆祝活动,直接的成果是中意两国学者参与的论文集《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陆国俊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书中收录顾卫民《中国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1874~1990)》一文,对1990年前的成果做了较全面综述。杨志玖在新时期又发表多篇文章,涉及到蒙元史、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诸多方面,结集为《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后增补为《杨志玖文集·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中华书局 2015)。

蔡美彪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马可·波罗归途记事析疑》、《马可·波罗所记阿合马事件中的 cenchu vanchu》(皆收入《辽金元史考索》),黄时鉴发表《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元代缠足问题新探》(皆收入《黄时鉴文集》)等文,澄清了马可·波罗以及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2001-3),全面梳理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所见旅居元代中国的欧洲人,证明马可·波罗来华并非孤例,而是有着元代中西交通畅通的大背景。2000年,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主办“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结集为《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收录了诸多元史专家的重要论文,包括邱树森《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穆斯林》、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王颀《马可·波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李治安《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党宝海《元代城墙的拆毁与重建——马可·波罗来华的一个新证据》、高荣盛《Choncha 与马可·波罗入闽路线》等。这些文章从许多不同的侧面考证了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重要细节。

进入21世纪,陈得芝研究与马可·波罗身份相似的畏兀儿人亦黑迷失,对元代贸易与交通进行了更深入阐发(《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背景解读》,收入《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党宝海《青山(Köke Aγula)与元大都》(《中国史研究》2011-4)、《“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清华元史》第1辑,2011)考订多语种史料中的地名,体现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林梅村《马可·波罗在北京》一文认为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居留之所可能是会同馆,并从考古、文物角度对会同馆及其附近的街道进行了考订。林梅村的另一篇文章《威尼斯“马可·波罗罐”调查记》(皆收入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文物出版社 2013),实地调查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一件马可·波罗家族遗物,发现其与中国南海沉船、菲律宾发现的南宋和元代德化窑青白釉瓷罐

非常相似，通过对比花纹，认为“马可·波罗罐”烧造于13世纪末。

2011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领衔启动“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组织世界范围的研究专家，进行马可·波罗书诸版本的汉译，诸家注释的汉译，集注与新注，以及开展相关研究。项目在《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期开始开设“马可·波罗研究”专栏，发表项目参加者以及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专栏所收文章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马可·波罗与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广泛涉及丝绸之路与蒙古帝国的诸多方面。目前已经出版到第16期。每一期都有2-5篇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邱轶皓《〈Jūng〉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ūng”》(第5期，2012)，党宝海《〈马可·波罗行纪〉畏兀儿君主树生传说补证》(第6期，2012)，马晓林《元代甘州十字寺鲁禾帖尼影堂设立原因探析——兼论马可·波罗所记河西景教》(第8期，2013)，党宝海《马可·波罗与蒙古帝国的牌符》(第9期，2014)，党宝海《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商品》(第10期，2014)，李鸣飞《顺风相送——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祈风仪式谈起》(第11期，2015)，冯鹤昌《13~14世纪中西交通史中的大黄》(第15期，2017)，等等。也在其他期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塔里木盆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项目组成员以马可·波罗为线索，研究了蒙元时期塔里木的几座绿洲城市。荣新江研究于阗(《真实还是传说：马可·波罗笔下的于阗》，《西域研究》2016-2)，罗帅考察鸭儿看、莎车(《蒙元时期鸭儿看的疆域与交通》，《西域研究》2017-1。《人口、卫生、环境与疾病——〈马可波罗行纪〉所载莎车居民之疾病》，《西域研究》2017-4)。2015年，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与扬州博物馆合作组织了以马可·波罗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汇聚了意大利、法国、美国、德国、中国、日本、韩国、伊朗等国的学者，论文结集为《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引入了欧洲抄本研究的成果，从礼仪和宗教角度研究蒙元时期的跨文化交流。

X. 展 望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蓬勃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研究视野从单纯的“中国史”、“中国边疆史”，扩展到了“内亚史”、“海洋史”、“全球史”。微观实证与宏观视野的结合，东西方的交融，已经是必然趋势。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很早就吸纳了欧洲的学术传统，重视多语种史料，具备超越国别史界限的潜质；而且长期以来的实证研究，积累深厚。例如马可·波罗研究，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民俗学、动植物学、文献学等多领域，以及诸多语种史料，可以说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缩影。丝绸之路研究所需的多种语言如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突厥语等，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较好的学术积累和后备力量，并日益受到重视。利用多语种史料，横跨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宏观视野和历史叙述，大概也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拓展方向。

〈参考文献〉

- [英] 道森编, 吕浦译, 周良霄注 《出使蒙古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 [英] 莫尔顿(A. H. Morton)、[伊朗]乌苏吉(Vosughi)、王一丹、周思成等 《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
- 安英新、邓丽 〈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察合台汗国钱币初探〉, 《新疆钱币》 2017-1。
- 蔡美彪、马文宽 〈元史扎你别进贡条诠释〉, 蔡美彪 《辽金元史考索》, 中华书局, 2012年。
- 蔡美彪 〈拔都平阳分地初探〉, 《辽金元史考索》, 中华书局, 2012年。
- 蔡美彪 〈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 《辽金元史考索》。
- 蔡美彪 〈马可·波罗归途记事析疑〉, 《辽金元史考索》。
- 蔡美彪 〈马可·波罗所记阿合马事件中的 cenchu vanchu〉, 《辽金元史考索》。
- 陈春晓 〈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 《北京大学学报》 2016-1。
- 陈春晓 〈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关系史新考——记1258~1265 年间的三次遣使事件〉, 《清华元史》 第4辑, 2018年。
- 陈得芝 〈刘郁 《常德西使记》 校注〉, 《中华文史论丛》 2015-1。
- 陈得芝 《蒙元史丛稿》,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 陈得芝 《蒙元史研究导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陈得芝 〈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 碑背景解读〉, 《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 陈得芝主编 《中国通史·第八卷·元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陈高华、陈尚胜 《中国海外交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 陈高华、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陈高华 〈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材料〉,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 第1辑,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 陈高华 《元史研究新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
- 陈高华 《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中华书局, 1986年。
- 陈佳荣、朱鉴秋编 《中国历代海路针经》,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6年。
- 党宝海 〈“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 《清华元史》 第1辑, 2011年。
- 党宝海 〈《马可·波罗行纪》 畏兀儿君主树生传说补证〉,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第6期, 2012年。
- 党宝海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孛罗城及其周边〉, 《西部蒙古论坛》 2015-4。
- 党宝海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商品〉,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第10期, 2014年。
- 党宝海 〈关于元朝犹太人的汉文史料〉, 《中国史研究》 2005-3。

- 党宝海 〈马可·波罗与蒙古帝国的牌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9期,2014年。
- 党宝海 《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
- 党宝海 〈青山(Köke Aγula)与元大都〉,《中国史研究》2011-4。
- 党宝海 〈昔里吉大王与元越战争〉,《西部蒙古论坛》2013-4。
- 党宝海 〈伊利汗国蒙古文牌符考释〉,《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党宝海 〈元代城墙的拆毁与重建——马可·波罗来华的一个新证据〉,《元史论丛》第8辑,2001年。
- 党宝海译注 《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邓进荣 〈元朝征爪哇史事考〉,《华冈史学》3,2015年。
- 费琅著,冯承钧译,陆峻岭注 《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1957年。
- 冯承钧、陆峻岭 《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
- 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 《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1936年。
- 冯鹤昌 〈13~14 世纪中西交通史中的大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2017年。
- 高荣盛 〈Choncha 与马可·波罗入闽路线〉,《元史论丛》第8辑,2001年。
- 高荣盛 《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高荣盛 《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
- 耿昇译 《柏朗嘉宾行纪》,中华书局,1981年。
- 韩儒林 〈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韩儒林 〈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
- 何高济译 《海屯行记》,中华书局,1981年。
- 何高济译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
- 何高济译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1年。
- 何高济、陆峻岭 《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华书局,2013年。
- 何启龙 〈七河景教碑属于阿儿浑人之说〉,《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2,2010年。
- 湖南省博物馆编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2018年。
- 黄时鉴 《波斯语在元代中国》,《黄时鉴文集》,中西书局,2011年。
- 黄时鉴 〈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黄时鉴文集》。
- 黄时鉴 〈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黄时鉴文集》。
- 黄时鉴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黄时鉴文集》。
- 黄时鉴 〈元代扎你别献物考〉,《黄时鉴文集》。
- 蒋其祥、李有松 〈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初步研究〉,蒋其祥 《西域古钱币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

- 李光斌 《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海洋出版社，2009年。
- 李光斌译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海洋出版社，2008年。
- 李军 〈“从东方升起的天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建筑学报》2018-4。
- 李鸣飞 〈顺风相送——从《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的祈风仪式谈起〉，《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1期，2015年。
- 李治安 《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元史论丛》第8辑，2001年。
- 李治安 《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年。
- 林梅村 《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年。
- 林梅村 《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
- 林梅村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文物》2018-12。
- 刘嘉伟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刘迎胜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 刘迎胜主编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
- 刘迎胜 〈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8辑，2001年。
- 刘迎胜 《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刘迎胜 《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刘迎胜 《话说丝绸之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
- 刘迎胜 《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三联书店，2013年。
- 刘迎胜 《蒙元史考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 刘迎胜 《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刘迎胜 《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再版。
- 刘迎胜 《小儿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 陆国俊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
- 陆峻岭编 《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
- 罗帅 〈蒙元时期鴉兒看的疆域与交通〉，《西域研究》2017-1。
- 罗帅 〈人口、卫生、环境与疾病——《马可波罗行纪》所载莎车居民之疾病〉，《西域研究》2017-4。
- 马保全 〈山东博物馆藏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世界宗教文化》2014-2。
- 马金鹏译 《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马晓林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年。
- 马晓林 〈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鲁禾帖尼影堂设立原因探析——兼论马可·波罗所记河西景教〉，《国际汉

学研究通讯》第8期, 2013年。

马晓林 〈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 《北京大学学报》 2015-1。

毛海明 〈元初诸王昔里吉的最终结局〉,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34, 2017年。

毛海明 〈元代的一个阿儿浑人家庭〉, 《民族研究》 2014-2。

纳巨峰 〈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 《民族研究》 2012-1。

牛汝极 〈十字莲花: 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牛汝极 〈新发现的十字莲花景教铜镜图像考〉, 《西域研究》 2017-2。

邱树森 〈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穆斯林〉, 《元史论丛》 第8辑, 2001年。

邱轶皓 〈(Jüng)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üng”)〉,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第5期, 2012年。

邱轶皓 〈14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刺和林情报考——兼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远洋商人〉, 《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荣新江 〈真实还是传说: 马可·波罗笔下的于阗〉, 《西域研究》 2016-2。

尚刚 《古物新知》, 三联书店, 2012年。

尚刚 《撒答刺欺在中国》,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9-1。

尚刚 《元代工艺美术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尚衍斌、黄太勇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年。

尚衍斌 《元代畏兀儿研究》, 民族出版社, 1999年。

尚衍斌 《元史及西域史丛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尚衍斌等 《饮膳正要注释》,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时光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舒健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的高丽王子考〉, 舒健、张建松 《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年。

宋岷 〈“回回石头”与阿拉伯宝石学的东传〉, 《回族研究》 1998-3。

宋岷 《回回药方考释》, 中华书局, 2000年。

汪大渊著, 苏继庠注解 《岛夷志略》, 中华书局, 1981年。

王颀 〈马可·波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 《元史论丛》 第8辑, 2001年。

王颀 〈元王朝与爪哇的战争和来往〉, 《史林》 2006-4。

王一丹 《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 昆仑出版社, 2006年。

王樾 〈对于察合台汗国钱币研究的若干认识〉, 程彤主编 《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 “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西书局, 2016年。

魏曙光 《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8年。

西蒙·圣宽庭(Simon of St Quentin) 著, 让·里夏尔(Jean Richard) 法语译注, 张晓慧译 《鞑靼史》, 《西域文史》 11, 2017年。

- 夏鼐 《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
- 萧启庆 《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
- 萧启庆 《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
- 徐忠文、荣新江主编 《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杨富学、张海娟 《从蒙古鹫王到裕固族大头目》，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 杨镰 《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杨晓春 《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
- 杨志玖 〈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 1-12，1941年。
- 杨志玖 《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杨志玖 《杨志玖文集·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中华书局，2015年。
- 杨志玖 《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 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 《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
- 余大钧、蔡志纯译 《普兰·迦儿宾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
- 余大钧、周建奇译 《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 余士雄编 《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 张佳佳 〈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 2010-5。
- 张星烺 《张译马哥孛罗游记》，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1929年。
- 张星烺译 《马哥孛罗游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
- 赵丰、尚刚、龙博编著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开明出版社，2014年。
- 赵丰 《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黄山书社，2016年。
- 郑伊看 〈蒙古人在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艺术中的“蒙古人形象”问题〉，《美术研究》 2016-5。
- 周良霄 〈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 2001-3。
- 周清澍 〈关于别失八里局〉，《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周清澍 〈马可·波罗书中的阿儿浑人和纳失失〉，《元史论丛》 第8辑，2001年。
- 周运中 〈岛夷志略地名与汪大渊行程新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7，2014年。
- 周运中 《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 이 논문은 2019년 5월 19일에 투고되어,
2019년 6월 17일까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심사위원을 선정하고,
2019년 7월 23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19년 7월 24일에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가 결정되었음.

Abstract**Chinese Studies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Ma, Xiaolin*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Eurasian Silk Road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has been increasingly valued worldwide. In China Mongol-Yuan studies have a long-standing academic tradition with a perspective beyond national history and close attention on multilingual literatures, which prove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Silk Road stud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inland Silk Road, immigrations, the spread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art, and travel accounts. In particular, the studies on Marco Polo covering various field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academics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Studies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Key Words] Silk Road; Eurasian exchanges; Mongol Empire; Yuan Dyna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